

13世纪至14世纪欧洲人游记中的蒙古人形象

刘迪南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亚非语言文学系, 北京 100871)

[摘要] 蒙古人西征打通了欧亚大陆,为东西方文化交流提供了可能。13至14世纪,欧洲的一些传教士和商人来到蒙古地区,留下了许多记录当时蒙古情况的书信和游记。通过对13至14世纪欧洲人游记、书信中的蒙古人形象的分析,探求这一时期欧洲人游记、书信中蒙古人形象的特点、形成原因及其对东西方文化交流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 蒙古人西征;欧洲人游记;蒙古人形象

[中图分类号] I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140(2011)05-0016-09

13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人类历史上发生了影响极为深远的事件——蒙古人西征。从此,蒙古人成为一支举世瞩目的力量。蒙古人西征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成吉思汗西征,时间在1218年至1224年;第二阶段是长子西征,时间在1235年至1241年;第三阶段是旭烈兀西征,时间在1255年至1260年。

蒙古人西征以摧枯拉朽之势打通了欧亚大陆。欧洲的传教士和商人成为第一批使者来到蒙古地区,留下了许多书信和游记作品。在这些文本中,传教士和商人们将所见所闻结合自己的“背景知识”,为后人勾勒出13至14世纪的蒙古人形象,这些记述成为欧洲人甚至整个西方世界认识蒙古、蒙古人甚至整个东方的开端。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欧洲传教士再次前往东方之前的几个世纪里,深深地影响着西方人对东方的认知。

一、游记产生的背景——蒙古人西征在欧洲引起的震撼和恐慌

蒙古人第二次西征即长子西征,征服了俄罗斯、进掠波兰和匈牙利,在欧洲引起极大震撼和恐慌。整个欧洲被来自东方的铁蹄弄得摸不着头脑,以至于认为蒙古人的入侵乃是来自地狱的“上帝之鞭”。他们对蒙古人一无所知,并且认为“由于我们的罪恶,我们不知道的部落来到了,没有人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他们是从哪里来的,也不知道他们的语言是什么,他们是什么种族,他们信仰的宗教是什么——只有上帝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他们从哪里跑出来的。”^①摆在欧洲人面前的是陌生和恐惧,他们急需解决的问题就是了解蒙古人,知道他们入侵的目的和今后的打算,以便应对这个突如其来的强大敌人。在这一背景下,基督教会的传教士们首先成为去往东方蒙古人“可怕世界”的使者,并根据他们的所见所闻留下了

^① 《诺夫哥罗德编年史》,转引自《出使蒙古记》,[英]道森编,吕浦译,周良宵注,1983年版,绪言第7页。

[收稿日期] 2011-07-11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规划课题“蒙古人西征与东西方文学交流和文化对话”(批准号:05JA750.47-9900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刘迪南(1978—),女(满族),内蒙古海拉尔人,讲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蒙古文化。

13 世纪欧洲人眼中关于蒙古人的第一手材料。这些材料成为后世欧洲史学家、文学创作者笔下蒙古人真实和想象的原型。

在蒙古人西征之后的一个世纪里,欧洲人关于蒙古的记载有 10 余种,包括游记和往来书信等。这些记载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欧洲人亲自来到蒙古和东方,根据自己的见闻而作的记录。其中包括:1.《柏朗加宾尼蒙古行纪》,作者是意大利人、方济各会修士约翰·柏朗加宾尼(John of Plano Carpini),于 1245 年至 1247 年出使蒙古。2. 法国人、方济各会修士威廉·鲁布鲁克(William of Rubruck)于 1253 年至 1255 年出使东方后写出的《鲁布鲁克东行纪》。3. 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Marco Polo)根据 1271 年至 1291 年的东方游历口述,由比萨人鲁思悌谦笔录而成的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4. 孟德·科儿维诺等教士的书简。5. 意大利人、方济各会修士鄂多立克根据 1318 年至 1328 年间东方旅行之见闻口述,由他人笔录而成的《鄂多立克东游录》等。另一类则是结合前人的材料,通过想象和分类整合所掌握的材料而写成的,如 14 世纪中叶由英国人根据前人游记等资料编写而成的虚构散文作品《曼德维尔游记》等。

上述这些欧洲人或亲历或想象而成的蒙古和东方游记在欧洲、西方甚至在整个世界范围内都产生过重要而深远的影响。首先,它们成为欧洲人了解蒙古、认识东方的案头必备文献,成为开启西方视野中蒙古和东方之门的敲门砖。这些作品奠定了西方人的东方认知,在 13 至 17 世纪中叶很长的时段内影响着西方人头脑中的东方观念。其次,这些作品激发了西方人对东方的想象和欲望,为西方迎来大航海时代,进一步发现东方和整个世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然,这一切的最初因由都来自于蒙古人西征带给欧洲人的巨大震撼,来自于欧洲人急于了解蒙古这个东方敌人这一目的。从这些作品中所记载的蒙古人的种种,不仅可以观察到 13 世纪蒙古人的形象,也能从这些西方使者描绘的蒙古人形象中透视出西方价值观下对蒙古乃至东方的认知取向。

二、游记作品中的蒙古人形象

蒙古人西征后的一个世纪里,欧洲人游记中的蒙古信息非常丰富,涉及到蒙古地区的地理、自然条件,蒙古人的生产、生活、习俗和性格,这些材料很多是随着游记作者的脚步和视线杂乱零散地出现的。我们把这些散落在游记中的有关蒙古人的记载整理起来,大致可以梳理出游记中给出的蒙古人形象,他们普遍塑造了具有以下特点的蒙古人形象。

(一)陌生可怕、茹毛饮血的野蛮人形象

13 至 14 世纪,记述蒙古人的游记作品中普遍将蒙古称为“鞑靼”,而相应的称蒙古人为“鞑靼人”。事实上,“蒙古人不愿被称为鞑靼人,因为鞑靼人是另一种种族。”^①鞑靼,译写为西文是 Tatar。然而后来多讹写作 Tartare。Tartare 一词在法语中有“地狱,来自地狱的魔鬼”之意,^②今在法国诸州尚以此名指恶人^[1]。这与欧洲人认为蒙古人是来自地狱的“上帝之鞭”也可相互印证。欧洲人对于蒙古人的恐惧在“鞑靼人”这个称呼上可见一斑。这些游记中谈及的“鞑靼”和“鞑靼人”也说明了在欧洲人眼中蒙古人是陌生而可怕的。如道森在《出使蒙古记》的绪言中提到,柏朗加宾尼出使蒙古,“他们在波兰和保加利亚度过大部分冬季以后,于 1246 年四旬斋开始启程进入草原。不知道他们是走向死亡还是走向生活,立刻就遇到了鞑靼哨兵,他们以可怕的样子向我们冲来,要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人。”^[2]对于柏朗加宾尼等人,蒙古地区和蒙古人是陌生而充满着不可预见的危险的,他们对出使蒙古地区心存疑惧。《柏朗加宾尼蒙古行纪》的绪言中作者直言不讳地写道:“尽管我们曾担心会被鞑靼人或者其他民族的人所杀戮或终生成为他们的俘虏,或者会遇到饥饿、干渴、寒冷、受虐待和过度的劳累会使我们难以忍受。所有这一切果然大量地降临到了我们头上,除了死亡和永远被囚禁之外,甚至比我们所想象的还有过之而无不

① 《鲁布鲁克东游录》,《出使蒙古记》第 139 页。

② 13 世纪至 14 世纪法语在欧洲大陆得到较为广泛的使用。

及！”

心怀恐惧的游记作者们进入蒙古地区之后，便开始观察和接受来自不同人群的有关蒙古人的各种信息。他们对蒙古人习俗的描写多集中在负面，从而塑造了蒙古人的野蛮形象。如柏朗加宾尼谈到蒙古人的饮食习惯，“他们的食物是用一切可以吃的东西组成的。实际上，他们烹食狗、狼、狐狸和马匹的肉，必要时还可以吃人肉。所以，当他们举兵进犯契丹皇帝臣民们的一座城市时，由于他们围城的时间拖延太久，鞑靼人自己的给养也匮乏，已经粮绝草尽，没有任何可吃的东西了。于是便从十个人中选择一位供大家分吃。他们甚至还把母马生驹时分泌的液体及其马驹同时吞噬。更有甚者，我们还发现这些人吃虱子。他们确实曾说过，‘既然它们吃过我儿子的肉和喝过他的血，难道我不应该把它们吃掉吗？我们甚至还发现他们捕鼠为食。’^[3]上述关于蒙古人饮食习惯的记述之中无疑有道听途说的成分，但大部分内容是符合事实的。从记述口吻中不难体察出作者对于蒙古人野蛮习俗的不解和吃惊。较柏朗加宾尼稍晚的修士鲁布鲁克也记录了关于蒙古人生活的“陋习”。“他们从不洗衣，因为他们说天神会因此发怒，并说如果他们挂起衣服来晒干，那会打雷的。他们甚至要打那些他们发现洗衣裳的人……他们从不洗碗，在煮肉时，他们用锅里煮的肉汤来冲洗盛肉的碗盘，再把汤倒回锅里。”^[4]其他游记中也有关于蒙古人喝马血，吃人肉、鼠类和动物胞衣以及粗鄙的卫生习惯等内容，中世纪来自欧洲的使者们以自己的习俗为参照点，给那些与之格格不入的蒙古人习俗打上了“野蛮”的印记。

(二)厚颜无理的形象

除了描述蒙古人的“野蛮”习俗之外，在游记中经常出现蒙古人向来自异域的使者不断索要礼物的情节。索要礼物让使者们感到棘手和无奈，甚至使他们感到厌烦。柏朗加宾尼在进入蒙古地区之前便听说，“当地人还索取大量礼品，既要送给诸王，又要送给官职高低大小不等的其他人，如果真是不肯以厚礼馈赠，他们就会鄙视你，会把你看得一钱不值，草芥不如。如果赠礼是代表一位大人物相送的，他们根本就不会接受微不足道的薄礼，而是说：‘你从一位大人物那里而来，而所给却如此微薄！’所以，他们甚至不屑屈尊收取。如果使节希望不辱使命而圆满地完成出使，那就需要他们更为慷慨解囊地以厚礼相赠。所以，我们被迫把自己的一大部分东西作为礼物馈赠他们，而这些东西本来是由信徒们施舍给我们作盘费而使用的。”^[5]鲁布鲁克修士也对蒙古人极力向使者索要礼物这一点有所耳闻。为了使自己的旅行一路畅通，他特地做了相应的准备，“按商人的劝告，我从康士坦丁堡随身携带了果品，麝香葡萄酒和精美的饼干，送给头一批（鞑靼）长官，好让我旅途方便些，因为在他们看来，空着手去是不礼貌的。”^[6]然而，即使是做好了赠送礼物的准备，当鲁布鲁克遇到索要礼物的蒙古人时，仍然感到很不愉快。“他们不论看到什么东西，就以一种最没有礼貌和最厚着脸皮的方式来索取，如果一个人把东西给了他们，那他就吃亏了。因为他们是不知感恩的。在他们自己看来，他们是世界的主人，并且认为任何人都不应拒绝送给他们任何东西。如果一个人没有送东西给他们，而以后又需要他们帮助，他们就不好好为他服务……这样，我们就离开了他们，的确，我感到好像从魔鬼的手掌中逃了出来一般。”^[7]从上面的文字中不难看出，传教士对蒙古人不断向他们索要礼物的反感，从而得出蒙古人是“厚颜”“无礼”的结论。

(三)富可敌国的蒙古大汗

13世纪至14世纪欧洲游记作品和书信关于蒙古人的记载中占绝大部分的是对蒙古大汗的记述。有的游记和书信中根本不提及一般的蒙古人，只是记述了蒙古大汗。这些记述都突出了大汗最显著的特点，即富有和无尽的权力。从描写大汗的吃穿用等各个方面来体现其无可匹敌的富有，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皇帝、头人和其他达官贵人都非常富有，黄金、白银、丝绸、宝石或珠宝应有尽有。”^[8]

“巴黎的威廉师傅……为蒙哥汗制造了一棵大银树，在它的根部有四只银狮子，每一只狮子嘴里有一根管子，喷出白色的马奶。在树干里面，有四根管子通在树顶上，管子的末端向下弯曲。在每根管子上面，有一条镀金的蛇，蛇的尾巴缠绕在树干上……在四只狮子中间，有四个银盆，准备各自承接一种饮料……这棵树有银制的树枝、树叶和果子。”^[9]

“向北方及东北方骑行三日，终抵一城，名曰上都，现在在位大汗之所建也。内有一大理石宫殿，

甚美,其房舍内皆涂金,绘种种鸟兽花木,工巧之极,技术之佳,见之足以娱人心目。”^[10]

“……他居住的宫殿雄伟壮丽。其殿基离地约两步,其内有二十四根金柱;墙上均悬挂着红色皮革,据称系时尚最佳者。宫中央有一大瓮,两步多高,纯用一种叫做密尔答哈(Merdacas)的宝石制成(而且那样精美,以致我听说他的价值超过四座大城)。瓮的四周悉绕以金,每角有一龙,作凶猛搏击状。”^[11]

“宫殿的厅堂布置豪华高贵,所有的装饰让人惊叹不已。首先,最上头摆着高高的宝座,正好在宴席桌旁。这个宝座由宝石和珍珠做成,而登上宝座的台阶用各式宝石铺就,镶以金边。”^[12]

游记作者们不惜笔墨描绘大汗的富有,就连虔诚的传教士科儿维诺向教皇汇报自己在东方传教情况的简短书信末尾,仍不忘提及“据我见闻所及,我相信在土地之广、人口之众、财富之巨等方面,世界上没有一个国王或君主可与大汗陛下比拟的。”^[13]尽管游记作者们已经极尽描写之能是,但他们通常都会在随后加上类似自己的语言在大汗的财富面前显得苍白无力,不足以描绘大汗的富有之类的话。同时,还谈到大汗的富有程度是难以想象的,即使描绘出来,对于未曾亲见的人来说也是难以置信的。可以说,第一批欧洲使者们对于蒙古大汗的大富大贵形象是达成共识的。

(四)信奉偶像教的异教徒

蒙古人西征后,来到蒙古地区的第一批使节便是传教士,同时也是第一批游记的作者们。他们东来的目的是刺探他们的敌人,使这些敌人皈依基督以便于利用。然而,当他们踏上蒙古的土地、了解到这些“野蛮人”后发现,“约翰长老”、“蒙古大汗信仰基督”这些传闻是多么荒诞不经,他们都是信奉偶像的不折不扣的异教徒。小教友会教友约翰·科儿维诺在致教皇的信中写道,“我递呈了教皇陛下的信件,劝告皇帝本人信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罗马天主教,但是,他对偶像教的迷信太深了。”^[14]传教士们对于蒙古地区的信仰情况给予了最大的关注,并且在游记中做了详细的记录。如教士柏朗加宾尼写道,“鞑靼人只信仰惟一的一尊神,它是人世间可见和不可见之万物的缔造者,他们认为它是人世间福祸的主宰者;然而,他们并不以祈祷、赞颂或任何一种仪式来崇拜它。但是,他们拥有一些用毛毡做成的人形偶像,将之置于自己的幕帐大门的两侧,并且还在偶像的脚下放置一些用毛毡做成的乳房一类的东西,他们认为这些偶像是畜群的保护者,同时也是奶汁和畜群繁殖的赐予者。”^[15]“他们从畜群和母马身上初次挤下来的奶供奉这些偶像。”^[16]“另外他们崇拜和敬仰太阳、月亮、火和水,甚至还包括土地。他们每天用最早的第一份饭菜和饮料来供奉他们,而且最喜欢在清晨吃饭甚至饮用东西之前举行”^[17]。传教士对中世纪蒙古人萨满信仰的描写可谓是翔实细致,为后人提供了关于中世纪蒙古人信仰的第一手材料。但是,对于以传教为目的的欧洲使者们,蒙古敌人们顽固的信仰却令他们头疼。尽管蒙古大汗并不反对基督教在其国度里传播,但却丝毫没有皈依基督的意思。《贵由汗致教皇英诺森四世的信》中对教皇希图蒙古人皈依基督的愿望给予了强硬的回绝,“虽然你又说,我应该成为一个虔诚的聂思脱里派基督教徒,崇拜上帝,并成为一苦行修道者,但是你怎么知道长生天赦免谁,他对谁真正表示慈悲呢?你怎么知道你说的这些话是得到长生天批准的呢?自日出之处至日落之处,一切土地都已被我降服,谁能违反长生天的命令完成这样的事业呢?”^[18]教皇和那些东来的传教士们希望以基督教来征服这些蒙古人的梦想在异教信仰的大汗那里遭到失败。执着的传教士们仍不死心,在聂思脱里派教徒宣扬的“约翰长老的传说”以及“蒙哥汗和贵由汗都是基督教徒”等传闻的鼓舞下,鲁布鲁克、约翰·科儿维诺、安德鲁、鄂多立克等传教士前赴后继东来传教,但结果并不如他们所愿,当他们来到蒙古地区立即发现,这些传闻纯属虚构。“他们(聂思脱里教徒)可以凭空编造一大堆故事,正如他们散布说撒里达是基督徒,蒙哥汗和贵由汗也是,因他们对基督徒比其他人更尊敬,尽管事实上他们都不是。所以关于这个约翰王有许多故事流传,而我在经过他的牧地时,除了几个聂思脱里外,却没有人知道他是个什么情况。”^[19]他们在信仰长生天的蒙古大汗面前无能为力,只能在自己的信件和游记中描绘这些野蛮而强硬的异教徒的偶像信仰。

三、13 世纪至 14 世纪东来的欧洲使者与蒙古人形象的形成

13 至 14 世纪欧洲人游记中关于蒙古人的记载是零散的,但也勾勒出了欧洲人眼中蒙古人的基本形象。这些形象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是真实可信的,但同时又存在着道听途说和杜撰的成分,这与东来的第一批欧洲使者有着莫大的关系。他们东来的目的、身份地位、视角以及他们的参照点和背景知识共同塑造了蒙古人的形象,成为欧洲人心中蒙古人形象的基础。

纵观东西方交流的过程,西方与东方相识最初的使者多是传教士和商人。想必只有信仰的力量和利益的驱使才会令他们有勇气、有毅力前往陌生甚至是可怕危险的地域,为了解这些可怕的“鞑靼人”,历尽艰险而不辱使命。他们所代表的利益、东来的目的和关注点决定了游记中对于蒙古人形象描述的取舍和偏好。

(一)《柏朗加宾尼蒙古行纪》和蒙古人形象的形成

1235 年,由术赤、察合台、窝阔台和拖雷四系的长子带领 12 万人的军队西征不里阿尔、钦察、斡罗斯、波兰、匈牙利,其征伐的铁蹄直抵多瑙河。1241 年,蒙古大汗窝阔台去世,蒙古人撤军东返,历时 7 年的长子西征结束。尽管欧洲大陆没有完全被蒙古人所征服,然而蒙古人对所到之处的侵略和蹂躏仍使欧洲和整个基督教世界不寒而栗。教皇为了刺探随时威胁欧洲安全的蒙古人的方方面面,同时希图蒙古人皈依基督教、为己所用而派出了第一批欧洲使者柏朗加宾尼等人。这些在教皇致贵由汗的信中非常明确。“我们听说,你侵略了许多既属于基督教徒又属于其他人的国家,蹂躏它们,使之满目荒凉,而且,你以一种仍未减退的狂暴精神,不仅没有停止把你的毁灭之手伸向更为遥远的国家,而且打破自然联系的纽带,不分性别和年龄,一概不予饶恕,你挥舞着惩罚之剑,不分青红皂白地向全人类进攻。因此,我们遵循和平之王的榜样,并渴望所有人类都应在敬畏上帝之中和谐地联合起来共同生活……”^[20]刺探和传教是柏朗加宾尼东来的两个基本任务。记录蒙古人的军事组织、军事实力、作战情况、统治政策以及如何应对蒙古人的侵略等内容成为柏朗加宾尼游记中的重点。除此之外,柏朗加宾尼的记载涉及了蒙古地区的地理位置、气候自然条件、蒙古人的相貌、衣食住行等风俗习惯以及蒙古人的信仰和性格喜好。在记录蒙古人各个方面信息时柏朗加宾尼使用了二元分类原则,即以自身文化为标准,将观察对象按照好与坏进行评价和分类。比如,作者将蒙古人的性格和风俗分为“好的”和“淳风”,以及“坏的”和“陋俗”。“淳风”包括蒙古人之间友好团结、相互尊敬、从不自相残杀、不存在偷盗行为、对于严酷的自然环境和恶劣的生活条件具有很强的耐受力等。而在柏朗加宾尼看来,蒙古人的陋俗主要有蒙古人对于其他民族十分傲慢粗暴、蔑视一切人、对他人说谎、很容易对他人感到不耐烦、狡猾并善于欺诈、不讲卫生,等等。显然,作者以欧洲人的性格以及习俗作为参照点来审视蒙古人,能够接受的性格和习俗自然成为“好”的,不能接受或者因此给欧洲人带来损失的部分则成为“坏的”,而且“坏的”远远多于“好的”。“要写下他们所有的坏性格,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的坏性格很多,写不胜写。”^[21]

从《蒙古行纪》我们体察到作者力求细致客观,甚至在该行纪的末尾作者还加上了证人的内容,以证明其所言不虚。然而,自身文化背景和价值取向始终制约着他,蒙古人西征带给欧洲人的恐惧在作者头脑中是挥之不去的,于是,茹毛饮血甚至吃人都理所当然地成为可以被欧洲人理解和接受的蒙古人的形象特征。同时,从基督教信仰的角度看来,这些信仰萨满的异教徒们是野蛮、蒙昧、未开化的一群固执的家伙。“一个异域形象一般包含着三种意义:异域的事实、本土的文化心理、本土与异域关系以及对这种关系自觉与不自觉地意识。”^[22]柏朗加宾尼游记中蒙古人形象,即是在西征的背景中真实的蒙古人与欧洲视角中的蒙古人之结合体。

《蒙古行纪》第一次详细记录了 13 世纪有关蒙古人的各种信息,并为欧洲乃至世界塑造了蒙古人的形象。这一形象成为后来多个游记中蒙古人形象的基础和主要参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其余几部游记中蒙古人形象的细微变化

继《柏朗加宾尼蒙古行纪》之后的一个世纪里,蒙古人的形象反复出现在《鲁布鲁克东行纪》

《马可·波罗行记》《鄂多立克东游录》《曼德维尔行记》等欧洲人的东方游记中。然而,由于作者的关注点和东来的目的不同,文中涉及到的蒙古人形象也有所不同。

较柏朗加宾尼稍晚的鲁布鲁克修士以更为细腻的笔法记录了蒙古人的世界。鲁布鲁克东行纪甚至被认为是“整个游记文学中最生动、最动人的游记之一,甚至比他同时代的马可波罗或19世纪的胡克和加贝特等人的游记更为直接和令人信服”^[23]。他对蒙古人的生活方式、性格和习俗的记录细致入微,对蒙古人生产、生活的细节着墨颇多,信息量远远超过了他的前辈柏朗加宾尼。鲁布鲁克没有过多的价值评判,而是以白描的笔法记录下他的所见所闻。然而,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让作者在叙述过程中感到困难。他写道,“当我来到他们中间,确实的,我好像正在进入另一个世界。事实上,如果我知道怎样绘画就好了,那我就可以为您画出每一事物的图画。”^[24]作为方济各会的修士,作者将大量篇幅用在描写蒙古人的信仰以及在蒙古人中间的各类教士、道人的传教活动。尽管一些学者认为,鲁布鲁克东来的目的并非单纯的传教,而是另有刺探蒙古人的政治军事力量的目的。^①但从游记中大量与传教相关的文字来看,传教是首要目的,这一点是无疑的。令鲁布鲁克失望的是,自己留在东方传教的要求也没有得到蒙哥汗的允许。当时执政的蒙哥汗并没有信仰上帝,仍旧炙骨占卜吉凶。而普通的蒙古人则敬天地、拜翁滚。《鲁布鲁克东行纪》提供了极多的有关蒙古人的信息,但可知的是,作者首要要告诉欧洲人的是蒙古人是偶像或萨满的坚定信徒,认为他们是信上帝或有可能信上帝的传闻都是无稽之谈,从宗教方面与蒙古人达成共识然后利用他们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

稍后的《马可波罗行记》与《鄂多立克东游记》对蒙古人形象的描绘有着共同之处,尽管两位作者的身份、地位和东来目的都不尽相同。^②首先,蒙古人形象在两游记中所占比例并不多,而且多集中在对蒙古大汗的记述上。马可波罗记述的蒙古大汗是忽必烈,而鄂多立克来华正值元朝帝位更迭最为频繁的时期。在他的游记中没有提到他亲眼见的是哪一位大汗。而他对大汗宫殿、用度之物等的描写与《柏朗加宾尼蒙古行纪》《鲁布鲁克东行纪》和《马可波罗行记》中的相关部分很相似。其次,两者的主要关注点在于沿途各种世俗事物,尤其是财富。作为商人的马可波罗对财富的关注是可以理解的,他的游记当中多次谈到蒙古大汗享有何等荣华富贵,大汗统治的国度富足到无可比拟。作为方济各会修士的鄂多立克似乎也未能免俗,在游记中无限烘托大汗之富有和东方之富庶。相比最初的两位使者的东方游记,《马可波罗行记》和《鄂多立克东游录》对于蒙古人的宗教信仰、军事政治实力的兴趣明显减少了,转而更多地记录了蒙古人统治区的财富和商贸情况。可见,蒙古人西征之后,13世纪末期到14世纪初叶,战争似乎已不再是欧洲人与蒙古人之间的全部主题,贸易的发展逐渐成为主角。

1357年成书的《曼德维尔游记》中蒙古人的形象便更少了,有关蒙古人的内容则主要集中在对大汗的描写上。该游记中提到,曼德维尔爵士^③东来的时间与鄂多立克东来时间接近,返回时间是在1356年前后。然而,游记中描绘的蒙古大汗却仍然是忽必烈汗。^④这是十分有趣而又耐人寻味的。学者们的研究已经证明了《曼德维尔游记》是一部“椅子旅行家”的虚假游记,作者本人根本就没有到过东方。然而这部游记却成为在欧洲影响最大的一部游记,其影响力甚至超过了《马可波罗行记》。游记中大量抄袭前人游记的内容,并在这些游记中最为吸引人的部分上大做文章,将东方的神秘和富庶形象推到了顶点。这里,蒙古人的衣食住行、性格风俗不再重要,只要知道统治着这个富庶东方世界的蒙古大汗就已足够。因此,在《曼德维尔游记》中,只是在“契丹王国”以及“契丹及契丹之外”两章中用了很简短的篇幅谈了蒙古大汗的财富和权力,以及“生活在契丹的鞑靼人”的零散信息。^⑤《曼德维尔游记》中记录的一则关于“鞑靼人”的有趣传说,展现了欧洲人头脑中鞑靼人的由来和他们思考鞑靼人的逻辑和背景知

① 参见《出使蒙古记》绪言。

② 马可波罗是来自意大利的商人。鄂多立克是来自意大利的方济各会修士。

③ 关于曼德维尔爵士究竟是何许人有许多种说法,一种观点认为叫做让·德布尔贡的比利时医生。也有人认为曼德维尔爵士是英国历史上真实的人物。参见《曼德维尔游记》,中译本序,郭泽民、葛桂录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

④ 忽必烈汗,元世祖,1260~1294年在位。

⑤ 参见《曼德维尔游记》,“契丹王国”“契丹及契丹之外”两章。

识。“故事始于闪(Shem),含(Cham)和雅弗(Japhet)——诺亚的儿子们居住在地球上。他继承了王位。含是三人里的反面角色,但他依然是最伟大最强大的,并且正是由于他的残暴而得到最好的领土——在东方,被称为亚洲的地方。……含的后代分成七支部族,在这七个部族中,最高贵最值得一提的是鞑靼部。在鞑靼人中间,‘一个并不富裕的高贵的老人’指的就是成吉思(Changuys)。一天晚上,成吉思做了一个梦,他梦见一个全身银白的骑士,骑着白马来看他。这个骑士是受上帝之托来告诉他,他将成为整个契丹的国王,骑士称他为‘可汗(Chan)’而那个被称为可汗的老人将成为国王。”^[25]这则传说从欧洲人的角度解释了鞑靼人的祖先和成吉思汗为何能征服大契丹的原因。按照这则传说,鞑靼人是诺亚的后人,而成吉思汗煊赫的地位则是上帝的旨意。尽管在欧洲人的心目中鞑靼人和他们的祖先“含”一样是个“反面角色”,但这并不影响欧洲人艳羡东方的富足和强大。尽管欧洲在鞑靼人的铁蹄下颤抖过,但并不妨碍欧洲人使用“儿子打老子”的阿Q逻辑。在《曼德维尔游记》成书的年代,对于欧洲人来自蒙古人的战争威胁已不存在,欧洲人对于东方的好奇和向往逐渐战胜了恐惧。这时,蒙古人的形象中最为突出的莫过于富贵的大汗形象。而《曼德维尔游记》中蒙古人形象已经彻底退居次要位置,而成为加重东方神秘、富饶形象的一颗砝码。

四、由游记中蒙古形象点染而成的诗作《忽必烈汗》

13至14世纪欧洲使者们的游记作品影响极为深远,这种影响远远超过了作者的写作目的。随后的几个世纪中,从法国伏尔泰的《中国孤儿》到英国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欧洲的许多文学作品中都反复出现蒙古人形象,进而成为欧洲文学作品中的主题形象之一。在这些形象中,想象与虚构的成分居多而与游记中的描绘相去甚远,但游记中蒙古人形象无疑是这些想象和虚构的最初基础。

1798年,英国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S. T. 柯勒律治^①创作的代表诗作《忽必烈汗》即是在披阅《珀切斯游记》一书,读到“忽必烈汗下令在此兴建皇宫和豪华御苑,于是十里膏腴之地都被圈入围墙”这两句时,进入梦境而成就的名篇。这首来源于梦境的诗作,一经发表就在英国风行一时,诗人浪漫神秘的笔触把西方人的眼光再次带到了遥远的东方。

点燃诗人创作热情的《珀切斯游记》是1625年英国著名的航海游记编撰者塞缪尔·帕切斯编撰的关于世界的百科全书。其中有专章介绍“鞑靼”,这些内容多来源于《鲁布鲁克东行记》《马可波罗游记》和《曼德维尔游记》。^②诗作《忽必烈汗》的创作因缘一直可追溯到5个世纪前蒙古西征和元帝国。然而,诗中的美景“徒有其名,却无其实”,忽必烈大汗的宫殿里竟是一派基督教天堂的景象。诗人“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26]而成的诗作真实用意何在呢?这样的疑问把我们的眼光带到诗人写作该诗的大时代背景中。

17至18世纪的欧洲,正是革命不断,各种新思想迭起的时代。英国开始于1689年的工业革命,除了带动生产力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还引发了一系列试图改变生产关系的大革命,发生在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就是其中之一,也是最具代表性的。柯勒律治就出生和成长于这样一个年代。1791年,诗人进入英国剑桥大学。这段时间的柯勒律治满怀诗人的抱负,十分同情法国大革命,他甚至与几个志同道合的诗人朋友计划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大同邦”。但是,随着法国大革命的失败,诗人对政治逐渐失望了,他的热情退却了。“他的大同世界——乌托邦的希望于1795年底彻底幻灭了”^[27]。诗人不能像思想进步、直面人生的大诗人拜伦和雪莱那样积极地面对生活,只能远离政治现实,利用荒诞、神秘的传奇诗来满足政治上和艺术上的追求^[28]。这一时期,柯勒律治的兴趣集中在写诗和旅行上^[29]。诗人正

^① S. T. 柯勒律治(1772年—1834年):19世纪英国伟大的诗人、思想家、评论家和理论家,代表作《老水手行》《克里斯德蓓》《忽必烈汗》。

^② 参见 Samuel Purchas; Posthumus Hakluytus; or, Purchas hispilgrims, containing 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Sea Voyages and Land Travels, by Englishmen and others.

是这一时期写下了《忽必烈汗》一诗。他把自己的政治抱负和艺术追求幻化成远在东方的古代君主隼丽的都城,那膏腴之地,那苑囿鲜妍,川涧蜿蜒,鲜花盛开,幽林苍郁的皇家园林就是诗人心目中人人平等的“大同邦”。

诗人透过忽必烈汗的宫殿,透过心目中对煊赫一时的蒙古大帝国的想象,紧紧抓住忽必烈汗这一形象的精髓,勾勒出带有浓重西方色彩的东方世界的景观,甚至使人对东方产生了“誓将去汝,适彼乐土”的向往之情。常人只在欧洲看到蒙古大汗的铁骑,而实际上他的威名和他的铁骑带到欧洲的东方文化也种在了柯勒律治这个英伦诗人的心田。蒙古大汗所建立的大一统的世界帝国,正是诗人心中的“桃花源”,它模糊了界限,融会了东西方,令人无限神往。诗人曾经破灭的政治抱负和他对东方“彼岸世界”的“大同邦”的无限向往在诗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这也是诗人创作《忽必烈汗》这首看似神秘莫测的传奇诗的真正用意。诗人通过《忽必烈汗》这首诗表达的对东方的神往之情并非“一己之私”,也反映了当时西方人对东方的普遍情绪,因此,诗作一经发表便风靡一时,成为当时西方上流社会的人们向往东方文明的指路标牌^[30]。

14世纪下半叶初期,蒙古大帝国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一事件引发的后果之一是欧洲人与蒙古以及中亚保持了两个多世纪之久的所有联系中断了,以后便完全停止了^[31]。而到了16世纪,欧洲在长达近两个世纪里和东方世界完全失去的联系又重新建立起来,与东方世界建立关系的心愿和对东方文化的兴趣压过了恐惧和敌意^[32]。正是此时,柯勒律治摒弃了对东方的不解和西方人对东方惯有的鄙夷和恐惧,带着对东方的强烈渴望,以非凡的理解力,将现实生活与自然景观完美结合,移入幻想的境域。这种移情入景的幻想,充满了一种强烈的渴望,一种对于前所未见的、足以使醒者醉、醉者醒的美丽但求一见的冲动。《忽必烈汗》就像一双灵巧的手,打开了封闭了两个多世纪的阻隔在东西方之间的大门,把“彼岸”——东方世界展现在西方人面前,使以诗人为代表的所有对东方心存向往的西方人,通过《忽必烈汗》这首诗将这种非凡的冲动宣泄了出来。

五、结 语

蒙古人西征打通了东西方交流的道路,随之而东来的欧洲使者则为欧洲和整个世界打开了了解东方的大门。欧洲人游记中的蒙古人形象是整个东方诸多个体形象中的一部分,在欧洲使者们基督教信仰的文化背景和特有视角的审视和评判下逐渐形成和不断变化着,从可怕的蛮族到富贵无比和拥有无上权力的蒙古大汗,历史的大背景和欧洲人的兴趣点及其价值评判标准共同塑造了欧洲人眼中的蒙古人形象。这其中真实的部分,也有被误读的成分,但对于欧洲人来说,这个业已形成的形象就是他们所认识和接受的蒙古人形象。直到几个世纪之后,欧洲人再次接触到蒙古的时候,这些形象才逐渐被推翻而获得新的认识和判定,然而这时欧洲变了,欧洲人变了,蒙古人变了,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说,“蒙古人的入侵具有深远的意义,因为他们促进了欧亚大陆间的相互影响……由这种相互影响提供的机会,又被正在欧洲形成的新文明所充分利用。这一点具有深远的意义,直到现在,仍对世界历史的进程产生影响。”^[33]的确,尽管学者们对于蒙古人西征的影响有着正面和负面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然而,谁都不能否认这场摧枯拉朽的征伐使西方与东方的交流成为可能,这种可能最终改变了世界。13世纪至14世纪,最初来到蒙古人中间的欧洲使者正是促成交流的第一股力量,他们将自己耳闻目睹的蒙古人形象带回了欧洲。后来者利用这些形象或抒发对东方的向往,或借这些形象言说自己或得意或失意的政治抱负和人生理想。这些形象脱胎于蒙古西征后的历史大背景,却在文学的涓涓细流中获得了新的生命,成为欧洲人反观自身的一面镜子。

参考文献:

[1][10]马可波罗行记[M].冯承钧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12.173

- [2][23][英] 道森. 出使蒙古记[M]. 吕浦译, 周良宵注.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绪言 19, 17.
- [3][5][8][15][16][17] 贝凯, 韩百诗. 译著. 柏朗嘉宾蒙古行纪[M]. 耿升译.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41, 55, 30, 31—33, 32, 33.
- [4][6][9][19] [美] 柔克义译著. 鲁布鲁克东行纪[M]. 何高济译.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218, 208, 194—195, 235.
- [7] 出使蒙古记[A]. 鲁布鲁克东游记[C]. 125.
- [11] 鄂多立克东游录[M]. 何高济译.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 80.
- [12][25][英] 约翰·曼德维尔. 曼德维尔游记[M]. 郭泽民, 葛桂录译.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6. 85, 87—88.
- [13][14] 约翰·孟帖·科儿维诺的第二封信[A]. 出使蒙古记[C]. 265, 262.
- [18] 贵由汗致教皇英诺森四世的信(1246年)[A]. 出使蒙古记[C]. 102.
- [20] [英] 道森. 教皇应诺森四世致鞑靼皇帝的两道敕令[A]. 出使蒙古记[C]. 吕浦译, 周良宵注.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92—93.
- [21] [英] 道森. 柏朗加宾尼蒙古史[A]. 出使蒙古记[C]. 吕浦译, 周良宵注.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17.
- [22] 姜源. 异国形象研究中的文化意义[J]. 社会科学研究, 2005, (2): 66—70.
- [24] [英] 道森. 鲁布鲁克东游记[A]. 出使蒙古记[C]. 吕浦译, 周良宵注.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113.
- [26] 鲁迅. 故事新编[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1.
- [27][29] S. T. Coleridge interviews and recollection, edited by Seamus Perry, Houndmills, Basingstoke, Hampshire; New York; Palgrave, 2000, P. 45(《S. T. 柯勒律治访谈回忆录》, 第 45 页。)
- [28] 杨德豫译. 神秘诗! 怪诞诗! ——柯尔律治的三篇代表作[Z].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2. 3.
- [30] 伊赫, 大方. 《忽必烈汗》与元上都[J]. 丝绸之路, 2001, (4): 59.
- [31][苏] 马·伊·戈尔曼. 西方的蒙古史研究[M]. 陈弘法译. 呼和浩特: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1992. 40.
- [32][法] 米丽耶·德特利. 19 世纪西方文学中的中国形象[A]. 比较文学形象学[C]. 孟华.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241.
- [33][美] 斯塔夫里阿诺斯. 全球通史—1500 年以前的世界[M]. 吴象英, 梁赤民译.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9. 393.

Mongolian Image in Travel Notes of European from 13th Century to 14th Century

Liu Di nan

(Asian and Africa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Department,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Beij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Abstract] Mongolian opened up the Eurasia when they made the expedition to the western world and provided the possibility of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the west and the east. From 13th to 14th century, some European missionaries and businessmen travelled to Mongolian area and left a number of letters and travel notes recording the situation of Mongolia. Through analyzing the image of Mongolian in the travel notes and letters of European from 13th to 14th century, the feature of Mongolian image, the reason of getting the stereotypical image and their influence to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the west and the east can be further explored.

[Key words] west expedition of Mongolian people; travel notes of European; Mongolian image

(责任编辑 贺卫光 责任校对 肇英杰)